

婚姻法如何成为新中国第一部法律

□ 张珊珍

群策群力的结晶

1950年1月21日，婚姻法草案呈送党中央，并附邓颖超亲笔信一封，信中写道：

这个婚姻条例草案，曾经过妇委正式讨论过五次，会后交换意见多次，并另邀请了中组部、中青委、法委等几方面同志共同座谈过一次、历时二月有余。几经争论，几度修改，有些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争论的主要问题，即一方坚持离婚，即可离婚，不附任何条件一则，至今仍意见分歧，尚未能取得一致。对于此点反对者是较多数人，赞成者包括我及少数人。现为了应各地的急需，且有关广大群众切身迫切的利益，不能再拖延不决。故大家商定，一致同意先以现在的草案，虽然我仍不完全同意，已经妇委多数同意了最后稿，并将我们不同的意见一并附上，请中央参阅作最后决定。另送了一份婚姻条例草案给法委，请法委将意见提交中央。

婚姻法草案在当时被分送各民主党派、中央人民政府、全国政协以及各司法机关、群众团体征求意见，又经政务院第二十二次会议讨论，并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委员、政务院总理、副总理和委员以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等参加的联席座谈会讨论两次，其内容和文字经过反复修改后定稿。

1950年4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草案）》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4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发命令，宣布“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七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应自一九五〇年五月一日起公布实施。自公布之日起，所有以前各解放区颁布的有关婚姻问题的一切暂行条例和法令均予废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自中央妇委着手准备至定稿历时一年半，各章各条都经过反复的斟酌、讨论和修改，凝聚着多方人士的心血。

新中国的献礼

几千年来，封建婚姻制度严重束

缚了中国人民的婚姻自由，断送了无数青年男女的幸福生活，更把一代又一代妇女推入痛苦的深渊。婚姻法以调整婚姻关系为主，明确规定“废除包办婚姻、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正如1950年4月26日《人民日报》中所说：“这部新的婚姻法完全符合全中国男女人民的一致要求。它的颁布有划时代的意义——废除了封建主义的婚姻制度，实行了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新的婚姻法代表中国广大劳动妇女的利益，它的宣传贯彻有利于实现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从而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推动了中国整体性的社会变迁。

婚姻法共8章27条，包括结婚条件、夫妻间权利义务、父母子女关系、离婚条件、离婚后子女抚养教育、离婚后财产和生活等。从内容上看，婚姻法中更多的条文在于对离婚的规定，充分体现婚姻自由中的离婚自由，以及离婚自由中对妇女在身心健康、财产补偿、抚养子女、再婚生活等方面的保护。婚姻法通篇贯穿四个原则：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彻底杜绝旧婚姻制度中买卖婚姻、重婚纳妾、童婚、收养童养媳、强迫守寡等陋习，同时倡导有利于建立婚姻美满、家庭和睦、男女双方身心健康新型婚姻家庭关系。

为保障婚姻法的顺利实施，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开展了宣传教育活动，并于1951年和1952年，连续下发关于宣传和检查婚姻法执行情况的通知和指示，1953年再次开展贯彻婚姻法运动月活动，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在短短的几年内，婚姻法的颁布和宣传贯彻彻底涤荡了旧婚姻家庭制度的污泥浊水，牢固树立起社会主义婚姻家庭新风尚。不仅如此，婚姻法将广大妇女从封建落后的思想意识和陈规陋习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中国妇女的精神面貌从此焕然一新，以自尊、自信、自强的姿态屹立于世界妇女之林。

在中国共产党将星云集的英雄群体中，有一位将军因特殊功绩而为人称道，他从未领兵打仗，却功勋卓著、声名显赫；他少年受洗入教，却倾心向党、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他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为党、国家和人民军队的医疗卫生事业奉献一生。他就是被毛泽东称为“华佗”的开国中将傅连璋。

悬壶济世 倾心向党

傅连璋1894年9月出生于福建长汀农村，出身贫寒，年少时跟随父母信奉基督教。他以优异成绩从亚盛顿医科学校毕业后，被聘为长汀福音医院医生，五卅惨案后被推举为院长。1925年底，他与邓子恢邂逅，邓子恢送给他几份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岩声》报和刊物《新社会观》，对他的思想产生很大影响。从此，傅连璋开始倾心于革命。

南昌起义爆发后，闽西中共党组织负责同志找到傅连璋，希望他能够做好接收起义军伤员的工作。傅连璋欣然接受了这个危险而艰巨的任务。起义军300余名伤病员到达汀州后，傅连璋把福音医院的全部药品拿出来，夜以继日地为他们治病疗伤，并动员妻子、女儿参与到医疗工作中。当时陈廉腿部中弹，伤势严重，有的医生建议给他截肢，傅连璋断然拒绝。经过精心治疗，陈廉的伤腿终于保了下来，两人也结下了深厚友谊。为徐特立治病期间，徐特立经常与傅连璋谈心，向他讲革命道理，对他触动很大，感叹道：“我当医生治好了他们的病，可他们治好了我的心，一个真正中国人的心。”在傅连璋亲自治疗下，起义军伤病员陆续痊愈并回到革命队伍。这次革命活动，给了傅连璋极大的心灵震撼，为他日后投奔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随着与革命队伍的接触和了解，傅连璋的心与共产党更近了。他利用给国民党军官看病的便利，获得一些情报，及时传达给当地党组织，避免了重大损失；在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进占汀州时，他提前做好接收伤病员准备，并向朱德建议，为红四军全军种牛痘疫苗，制止天花蔓延，保护了革命队伍；他利用自己家被国民党军强占为“公馆”的机会，机智地获得一箱军用地图，还订阅了《申报》等报纸，想方设法转交给毛泽东。后来毛泽东曾当面对他说：“你送来的报纸和地图真是帮了大忙了，我要感谢你。”傅连璋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利用自己的优势，为党做着大量有意义的工作。

矢志不渝 忠诚于党

1932年，福音医院创办了中央苏区第一所“中国工农红军看护学校”，傅连璋兼任校长，并亲自编写课本教程，带领学员临床实习，为革命军队培养了一批急需的医护骨干。毛泽东对傅连璋也有了更多了解，帮助他分析作为一个基督教徒能够参加革命的思想原因：“你能参加革命，和出身有关，你是受压迫阶级出身。”毛泽东的一席话，打消了傅连璋的顾虑和担心，使他更加坚定了投身革命的决心和信念。“我相信终有那么一天能站在党旗下，向党交出一颗心，把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员，一个共产党员。”

傅连璋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为了革命将福音医院搬到瑞金，还把医院所有家产及药品捐献出来。《红色中华》报专门发表《红匾送给捐助巨产的傅院长》一文，表扬他是“苏区第一个模范”。傅连璋被任命为中央红色医院院长，他严谨细致的医德医术，赢得了很高的声誉。王稼祥、蔡树藩、伍中豪等将领都在他的精心施治下得到痊愈。第五次反“围剿”紧急关头，毛泽东身患恶性疟疾，也是在傅连璋亲自诊疗下及时恢复健康。毛泽东说：“我们现在也有华佗，傅医生就是华佗。”

长征中，傅连璋跟随大部队在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提出预防为主的方针，强调部队注意饮食卫生，防止蚊虫叮咬、不喝生水等措施，为部队卫生保健工作作出了贡献。傅连璋为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治病，并采取土办法为部队官兵治疗伤寒病。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他组织了随军医疗培训班，为红军储备了医务人员。

红军到达陕北后，他参加了中央党训班学习，在毛泽东和陈云亲自安排下，被正式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傅连璋担任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兼中央医院院长后，面

傅连璋：『红色华佗』开国中将

□ 朱志伟

对陕甘宁边区极其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他殚精竭虑，组建了层次合理的医疗卫生队伍，努力提升医院软硬件水平；他坚持五湖四海，广纳贤良，吸引许多国统区的医疗专家及外国专家投入到党和人民卫生事业中；在边区开展卫生防疫运动和群众卫生工作，努力改变边区民众落后的卫生观念和卫生习惯；他还负责中央领导同志的保健工作，形成了早期治疗、重视“治未病”、注重起居调节等保健工作的优良传统。他提议在延安成立保育院，专门接收革命后代，解决了许多人的后顾之忧。他忠诚于党、医者仁心，受到了自上而下的尊重和称赞。傅连璋50寿辰时，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等专门为他送去“治病救人、长命百岁”的贺词。周恩来称赞他是“有功之人”。

践行使命 尽职为党

入党之后，傅连璋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共产党员的使命担当，并为之奋斗一生。傅连璋早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向毛泽东写信，要求捐献遗体，留作医学之用。为了党的长远发展，在党向东北地区派出大批干部时，他向毛泽东提出建议，选派卫生干部去东北，为解放大城市后城市卫生管理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傅连璋还提议召开全军第一次药材会议，集中解决卫生战线存在的各自为政、供给不均的问题，有力支援了战略反攻阶段的各个解放区；1949年9月，他参与主持了第一次全国卫生行政会议，确定了有深远意义的预防为主的健康建设总方针。

新中国成立后，傅连璋任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中华医学会理事长等职务，参与筹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确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三大原则，作出了医学教育等重大决议。面对旧中国就存在的传染病、流行病，他指导实施了鼠疫防治等重大工作。他从人民军队的卫生建设和医疗业务出发，领导制定下发一批法规性文件，编写大量军事医学读本，推动了军队军事医学知识普及和部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

他全面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贯彻“团结中西医，发展和实行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指导方针，开展学术交流，创办医学杂志刊物，亲自发表科普文章，展示了一名优秀的党的医疗卫生领导者的远见卓识和使命担当。他注重培养人才队伍，为党和军队培育了一大批优秀医务工作者。

傅连璋用自己的赤胆忠心、高超医术、高尚医德诠释了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的崇高品质，书写了“红色华佗”的传奇人生。

黎明前夕的受命

自1922年召开的中共二大第一次做出《关于妇女问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就把争取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写在自己奋斗的旗帜上。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各个根据地的工农民主政权在马克思主义婚姻家庭理论指导下对婚姻家庭制度做了最初探索，如1930年闽西根据地的《保护妇女青年条例》《闽西婚姻法》；1931年鄂豫皖根据地的《婚姻问题决议案》等。1931年，毛泽东签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明确提出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等原则。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不断壮大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将妇女解放和婚姻家庭制度的改革不断推向前进，《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法暂行条例》等相继出台，确定了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家庭制度基本原则。

1948年秋天，解放战争即将迎来胜利曙光，新中国的蓝图在中共领导人的脑海中徐徐展开。这时，如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解放妇女，如何在即将到来的新中国建立一套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家庭制度，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重要准备工作。9月20日至10月6日，解放区妇女工作会议在号称共和国摇篮的西柏坡隆重召开，华北、西北、山东、华中、华南等解放区的妇女干部85人出席这次会议，另有中共中央直属机关80多名干部列席。就在这次会议期间，刘少奇召集中央妇委负责人布置了准备制定新中国婚姻法的

让东北抗联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异彩

□ 何伟志

在14年抗日战争中，东北抗日联军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这部壮丽史诗中最惨烈、最艰苦、最令人动容的重要篇章，铸就了“勇赴国难，自觉担当，顽强苦斗，舍生取义，团结御侮”的东北抗联精神。我们要深入挖掘和彰显东北抗联精神的时代价值，让东北抗联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异彩，使东北抗联精神历久弥新、薪火相传。

在弘扬东北抗联精神中坚定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挺起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

东北抗联这个英雄群体孤悬敌后，人数最多时有3万余人，最少时仅千余人，在战争环境艰苦到了生命极限时仍然能够坚持抗战，这源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树立起来的驱逐日本侵略者、取得民族独立与解放的信念。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白雪铺满大地，山中雪积及尺……抗日救国战士，犹着单衣水鞋，日夜出没于寇贼倭奴之封锁线，其困苦颇甚。”如果没有强大的信仰信念信心作支撑，任何人恐怕都难以在这种环境下生存。东北抗联将士正是凭着这种坚定信念，凭借勇于担当的精神力量的支撑，在血与火的战争年代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决战，在日军日夜不休的军事“围剿”、时时刻刻的政治诱降、苛刻严密的经济封锁下，东北抗联的旗帜始终不倒，为全国抗战的最

任务。

据时任中央妇委委员的罗琼回忆：一天傍晚，邓颖超对妇委的同志们说，“少奇同志让咱们过去一趟，要布置新的任务”。当时中央妇委驻东柏坡，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住在西柏坡，东、西柏坡相距二三里地。那时，刘少奇与王光美刚刚结婚不久，刘少奇就在两间土墙泥顶的新房里，热情接待了妇委会的负责人。他表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很快就要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不能没有一部婚姻法，我们这么个五亿多人口的大国，没有一部婚姻法岂不乱套了？这个任务交给你们中央妇委，你们马上着手，先做些准备工作”。

为即将到来的新中国拟定一部婚姻法，这是一项神圣而又艰巨的任务，中央妇委当即成立了以邓颖超为首的起草小组，成员有帅孟奇、杨之华、康克清、李培之、罗琼和王汝琪等。虽然成员当中只有王汝琪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真正学过法律，但其他同志有着长期的革命斗争经历，更有做妇女工作的经验。起草小组主要的参考资料是刘少奇提供的那份1931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因关系五万万同胞的婚姻、家庭幸福问题，起草小组的同志们极为慎重，几次派出工作组就婚姻问题进行专题调研，共同商议，几易其稿。讨论中争议最大的是第9条：“确定离婚自由，凡男女双方同意离婚的，即行离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亦即行离婚。”虽然离婚自由已成共识，但有的同志担心离婚太自由会不利于社会稳定，尤其在农村，必定要触动一部分农民的切身利益，导致他们成为反对派；另外一些同志则顾虑马上就要进城，担心进城以后，一些干部以“离婚自由”为借口，另觅新爱，抛弃农村的原配。但邓颖超态度鲜明，主张一方坚持可以离婚。

1949年3月23日，中央妇委随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一起离开西柏坡迁往北平，根据新的形势和要求，中央妇委进一步对婚姻法条例草案进行讨论和修改。

在弘扬东北抗联精神中汲取实现中国梦的前行力量，厚植爱国主义情怀的精神基石

后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

东北抗联将士所展现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优秀精神品质，正是东北抗联精神的灵魂。东北抗联将士明知抗日斗争是长期和艰巨的，明知在有生之年可能看不到胜利的曙光，明知自己牺牲后可能默默无闻，却仍然坚信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实现，坚信抗日战争一定会取得胜利。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之路艰辛无比，一个又一个家庭的破碎、一个又一个生命的逝去，无数英雄将士的牺牲最终换来了民族独立、祖国的解放。在弘扬和宣传东北抗联精神中国本强基，补足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之“钙”，有利于挺起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坚定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从东北抗联精神中汲取实现中国梦的前行力量，厚植爱国主义情怀的精神基石

东北抗联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这种爱国主义情怀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空前的，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彰显了东北抗联将士超乎寻常的历史担当。东北抗联将士来自不同民族和社会不同阶级、阶层，其出身、经历各异，但当外敌侵入时都怀着“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爱国主义情怀，毅然决然走上东北抗日战场。抗联英雄杨靖宇在林海雪原中与日寇战斗到最后一刻，面对敌人的劝降，他掷地有声地说：“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人吗？”以身殉国后，敌

在弘扬东北抗联精神中发挥和彰显党的政治优势，打造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思想利器

人残忍地剖开了他的腹部，发现只有树皮、草根和棉絮，一粒粮食也没有。正是这种朴素、真挚的爱国主义情怀，让东北抗联将士把自己的生命与祖国的命运、与人民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身而出、勇赴国难，以满腔热血担当起保卫祖国、捍卫国家尊严的历史使命，向全世界人民昭示了“以天下为己任，为人民谋福祉”的革命胸襟和担当意识。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都蕴含着东北抗联精神的“遗传基因”，贮藏着东北抗联精神的“内核密码”。作为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更需要铭记艰苦的抗战岁月，读懂苦难的光荣历史。弘扬和传承东北抗联精神，厚植爱国主义情怀的精神基石，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好脱贫攻坚战、推进扫黑除恶、应对社会突发事件、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实践中，培养出一大批心中有梦、忠诚报国、敢于担当的党员干部和先进分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断注入新的前行力量。

在弘扬东北抗联精神中发挥和彰显党的政治优势，打造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思想利器

东北抗日联军是党直接领导的东北各族人民的抗日武装，是人民军队

